



張清富

## 壹、前言

在現代社會中，一般社會大眾對於貧窮仍有刻板印象，深信個人因缺乏工作動機，努力不足，才會落入貧窮的困境，因而認為貧窮是個人因素所造成，實屬應得。然而，如果貧窮是因缺乏工作動機所造成，那麼，勤奮工作者是否可以免除貧窮的威脅呢？其結果顯然未必。顯然地，有些人縱使勤奮工作，但仍然落入貧窮的困境。

何以如此，因為在現代社會中，薪資報酬是家庭生計的主要來源。因此，接近勞力市場，取得報酬，就成為個人或家庭生活安全的重要保障。理論上來說，就業可以提供個人或家庭生活的保障，免除經濟安全的疑慮，所以現代政府的重要職責所在就是提供人民「免於匱乏的自由」。職是之故，由於經濟不斷的發展與成長，人類科技的進步，社會也創造了許多工作機

會。由於工作機會增加，就業機會增多，因此，社會並沒有貧窮問題存在，也沒有值得同情的窮人（湯新楣譯，1970，頁271）。因為早在農業社會裡，一般人就認為不工作是個人懶惰及不遵從社會工作倫理所致，到了工業社會這一理念更為多數人所接受（王順民，1996）。

這種現象和社會的工作倫理與社會規範有密切的關係。一般人認為工作倫理包括下列幾點信仰：第一，每一個人必需努力工作，並且和其他人競爭；第二，這一努力的結果使人成功；第三，機會均等，成功事實上也是這一結果；第四，不成功是個人的不對以及個人缺陷的表現(Woods and Williamson 1988, P.65)。然而，這一信念顯然忽略社會結構元素的影響。例如，就業需求的轉移等。

我國社會強調勤奮工作是人生最重要的價值觀，勤儉的精神早已深植一般人的心中。勤儉觀念等同道德倫理準則，社會上不應有無助的窮人，而貧苦與無依被視

為同義詞(梁其姿, 1993)。時至今日, 勤勞與敬業的人力資源可以說是臺灣或東亞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因素。這正如同西方學者 Weber (1958)在「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揭示的信念一樣, 那就是勤、儉、有信用和誠實是西方資本主義成功的重要因素, 賺錢是上帝所賦予的天職。儘管人類科技已有長足的進步, 但勤奮工作仍是提高生活水準與經濟發展成功的不二法門, 這在東、西方社會皆同。

社會上一般的觀念認為, 落入貧窮的困境主要是因為他們拒絕工作以及政府的慷慨救助所造成, 由於長期依賴政府補助, 使得他們有恃無恐, 不願意加入就業市場的行列, 終至陷入貧窮的困境中而無法自拔(Murray, 1984)。然而, 這一看法並不完全正確。因此, 固然有工作可以讓多數人生活富足無憂, 但這並不保證任何每一個人或家庭都可以脫離貧窮(Devine and Wright, 1993), 這就是一般所謂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問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從理論的觀點談工作貧窮的現象。

## 貳、理論基礎

大致來說, 有關貧窮的研究可以分成兩大不同派別(Beeghley 1988; Kerbo 1991; Townsend 1993)。一派認為貧窮是因個人因素所造成, 這一派可稱為個人致貧因素論; 而另一派則認為貧窮是因社會結構變動所致, 這一派可叫作結構因素論。本文僅就上述兩種理論加以探討。

### 一、個人致貧因素論

一般而言, 社會科學家有關貧窮的研究, 以探討窮人的個人背景特徵較為成功, 亦即那些人是窮人。這種以窮人的背景因素以及窮人本身所造成的問題為主要研究的範疇可分為兩大主流, 一派以經濟學的人力資本理論(human capital) (Becker 1964; Thurow 1971)或社會學的地位取得理論(status attainment) (Blau and Duncan 1967)的觀點來描述貧窮的問題; 另一派則是美國人類學家 Lewis (1959, 1961, 1968; 丘延亮譯 2004)所提倡的貧窮文化論(culture of poverty)。

#### (一)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論者認為貧窮乃是個人人力資本欠缺所致, 這在經濟學上的解釋主要以芝加哥大學的 Becker (1964)為主, 而在社會學上則以 Blau 和 Duncan (1967)的觀點為代表。他們均認為教育是影響個人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 教育程度高, 收入較高, 不易落入貧窮的困境; 反之, 教育程度低, 淪入貧窮的風險增加。換句話說, 一個人的貧窮主要是缺乏教育、訓練、技術或語言能力等所造成。因此, 缺乏人力資本, 阻礙了個人的經濟及社會流動。由上所述, 可知人力資本論強調個人的弱點。脫離貧窮的不二法門就是讓每一個人有適當的教育與技術, 才能讓社會上每一個人找到適當的工作, 故他們認為貧窮是個人的問題而非政府或社會的問題。

Blau 和 Duncan (1967)的研究認為, 影響個人職業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個人的教育，而相對地，父親的教育程度對兒子的第一個工作和目前職業並無直接的關係，而是間接透過父親職業與兒子教育而來。因此，父親的背景因素對兒子的職業並無多大影響。由人力資本論的看法，我們可以知道貧窮是因人力資本投資較少，造成個人技術與學習能力較差，形成在勞動市場上的生產力較少，因而影響個人的收入所致。在先進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有關教育成就和收入的關係一致顯示，教育年數與收入水準有正相關(Blau and Duncan 1967)。若將個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因素控制後，教育程度與收入的關係仍然很高(Becker 1964)。

由於教育素質是取得工作的先決條件，再加上教育水準的提高，使得一合理的工作往往有很多競爭者爭取工作，這使得低教育程度者注定是輸家。因此，教育程度的高低就成為收入高低的依據，這使得教育程度低者較易落入貧窮的困境。在臺灣，相關的研究也證實，人力資本較差，無法找到好的工作，只能找到壞而報酬又低的工作，因此，雖然有工作，但仍然落入貧窮的行列（王維林，1962；陳淑英，1983；張清富，1992, 1995；溫秋蘭，1993；廖偉君，1992）。

雖然，有些學者認為貧窮對社會有其貢獻。例如，Gans（2005；劉鶴群、房智慧譯，2005）曾指出窮人的功能有：第一，窮人的存在代表骯髒的工作（實質意義上的骯髒或是危險、費力、低廉、無尊嚴與枯燥的工作）能用低價雇人操作。第二，貧窮實際上創造出「服務」窮人的職業與

工作機會，如公共醫療專家、社工人員等，以及非法職業如毒販、賭場跑堂等。第三，將窮人當作偏差標示出來，加以懲罰，維持傳統社會規範與主流價值（勤勉、節儉、誠實）的正當性。第四，在階級社會中，窮人的存在保障了富人的高社會位階，而富人通常以「自作自受」(blame the victims)為理由，來解釋社會不平等與窮人的弱勢地位，並由此產生自我滿足感。第五，由於缺乏政治力量，窮人經常承受社會變遷的代價。在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政策之下，從療養院出來的精神病患常被「棄置」在低收入社區或鄰近地區；同樣地，供吸毒者更生的中途之家常被富裕的社區排斥，最後只能在貧窮的社區內落腳。

雖然，窮人對社會有這些貢獻。但窮人縱使願意去做穩定的工作，但這些工作往往無法養家糊口，有時候甚至於這種工作也不可得(Liebow 2003)。雖然 Liebow 的研究只是針對某些個案所得的結論，但這種情況顯然不是少數，而是許多窮人的寫照，不管以前或現在都是一樣。例如，1987年時，美國約有一百萬貧窮家庭戶長屬全職工作者，三十萬九千貧窮家庭戶長是兼職工作者(Schiller 1976)。若以所有的貧窮人口來看，約有三百萬人屬於全職工作者，而在兩千兩百萬十五歲以上的窮人之中，超過九百萬人在整年中工作一段時間(Woods and Williamson 1988, P.65)。Harrington 的研究也證實近年來貧窮人口中成長最快的團體是工作貧窮者而非接受福利救助的窮人（引自 Jennings 1994,

p.77)。此外，Cloward 和 Piven 的研究也指出在 1990 年年滿十六歲以上的全職工作人口中有一千四百四十萬人（佔 18%）全年收入低於貧窮線，比 1984 年的一千零三十萬（佔 14.6%）及 1974 年的六百六十萬人佔 12.3%）多（引自 Jennings 1994, p.43）。著名的社會學家 Wilson(1996, P.36) 在「當工作消失時」一文中曾經寫道：「位於芝加哥南郊的 Woodlawn 曾經擁有超過 800 家企業與產業，五十年後的今天只剩下大約 100 家店面，大多是理髮店、小商店及小飯館。一個離鄉多年後返鄉的 Woodlawn 居民感嘆地說：『我真的訝異，這些資源就這樣不見了……還有房子……人都走光了，到處都空蕩蕩的。』」（Wilson 1996, p. 5）另一個南郊居民也如此說：『以前有很多工作機會，你只要走出家門就能得到一個工作……現在就不是這樣了……大多數的人想要工作，卻找不到工作。』（Wilson 1996, p.36）。』（引自劉鶴群、房智慧譯 2005, 頁 260）最近，Ehrenreich (2005)與 Schwartz-Nobel (2003)認為，時薪太低，因而所得太低，無法糊口，使人永遠落入貧窮的困境，這是針對工作貧窮深刻的詮釋。在臺灣方面，根據研究，臺灣的低收入人口中約有約有二成屬於工作貧窮（張清富，1996）。

作家鍾喬（1992，頁 128）在「城市邊緣」一書中寫到一個貧困個案時如此說：「我今年都四十二歲了，二十六歲時，我就幹這臨時清潔工的活。從一天五十元做起，到現在每天三百五十元。每個月並不是天天都有馬路掃，因此收入不穩定，

為了貼補家用，我還得在掃馬路之餘到工廠做電扇加工的差事。這加工的工作和掃馬路一樣都是臨時性的，一天十個小時做下來，大概有三百元可以賺罷！很少，實在少得可憐，但又有什麼辦法呢？」。因此，儘管工作可以增加個人或家庭脫離貧窮的機會，但是，有工作卻也可能讓個人或家庭生活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這種情況與 Wilson 及 Ehrenreich 一致。

## （二）貧窮文化

一個人的生活態度與價值會影響個人的行為，這些價值規範充份發揮其功能，左右個人的行為。因而，一個人在社會上的適應是否良好，就會影響其行為的表現。若個人能和主流的中、上階層文化相契合，則個人在社會上的適應就沒有問題。反之，若個人的價值觀和主流文化不相容，則個人在社會上的適應就會產生困擾，因而有所謂的「反功能」價值，這些價值和主流文化相違背，但卻是這些人適應其生存環境所需的工具。這些「反功能」價值就是窮人所享有的，因此，窮人所擁有的價值觀和一般社會大眾不同。雖然，社會主流文化以中、上階層為主，但窮人也有他們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和主流文化並不一樣。所以，窮人的行為方式也和社會大眾不同。

一般認為個人的價值、態度和信仰，會形成窮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同時這些價值、態度和信仰會經由社會化代代相傳（Patterson 1981; MacNicol 1987）。然而，認為貧困家庭擁有的價值與行為和其餘大眾

不同的看法卻是 1960 年代「貧窮文化」發展及流行之後才漸受關切，這一議題主要是由於美國人類學者 Lewis（1959, 1961；丘延亮譯，2004）詳細探討墨西哥及波多黎各窮人的生活方式而引起大家的注意。

Lewis (1959, 1961；丘延亮譯 2004) 認為，貧窮文化由三項相關的成分所組成。第一、窮人的價值、態度與信仰與其餘社會不同，這些價值、態度與信仰即宿命觀、無助感、依賴性與無法延遲快樂的享受等。換言之，他們只看到眼前的一面（今日取向），而無法把眼光放向未來（未來取向）。第二、他們行為的表現方式不是反社會的行為，就是忽略社會已建立的規範，這些行為的方式就是雜亂的、非法的、家庭暴力的以及不參與政治、社會或社區制度等。第三，一組不需要的生活條件，即過度擁擠、失業、不健康、不識字及受剝奪等。Lewis 認為最重要的元素是第一項，它主宰窮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影響也最大。

Lewis (1959, 1961；丘延亮譯，2004) 觀察拉丁美洲及美國都市的墨西哥及波多黎各家庭之後，發現貧窮文化會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會在社會主義的社會產生，他如此地深信著。同時，他認為貧窮文化最容易發生的時期是人口由鄉村大量遷移到都市的時候。貧窮文化的產生，主要是窮人面對困境時的一種適應方式，Lewis 認為這是貧窮文化的第一個特徵。換言之，窮人為了適應困苦的社会經濟環境下所產生的價值與態度，畢竟與社會大眾的思維方式不同。然而，這些態度與價

值不僅與主流文化不同，同時也比社會的主要價值不值錢。雖然窮人知道中產階層文化，也時常提到中產階層文化，也認為自己擁有一些中產階層文化，但整體而言，他們並不生活在中產階層的主流文化中。

貧窮文化的第二個特徵是，這些文化可以經由家庭的社會化而代代相傳。這也就是說，子女由於長期在父母照顧下，因而耳濡目染，近朱則赤，近墨則黑，子女吸收父母的價值觀念，將這些貧窮文化視為己有。因此，這些文化代代相傳，經過幾代之後，窮人就和主流社會隔絕。如此，形成當時 Harrington (1962) 所說的「內部的外人」(internal aliens)，這些也就是十九世紀所謂的不應救助的窮人。

貧窮文化的第三個特徵是有關政策的意涵。Lewis 認為貧困兒童可能心理上無法掌握其一生中遇到的有利時機或增加其向上流動的機會，因而必須使兒童再社會化，才能脫離貧窮的困境。然而，Harrington 卻明白表示，政府必須提供完善的方案（包括心理、社會、生理及經濟面）以面對貧窮文化，因而在 1960 及 1970 年代美國政府大力擴展及改良社會政策。當時的美國政府當局認為，窮人家庭的子女必須給予技術訓練，強化他們的動機，如此才不會成為貧困的成年人。然而，由於沒有考慮到就業的結構變遷以及薪資模式，因此，直到 1980 年代，這些政策因受預算刪減才改弦更張。

儘管貧窮文化爭議仍大，但在美國，貧窮文化的論戰自 1960 年代後並未消

失，只是由社會底層(underclass)所取代，這在 Auletta (1982)的書出版後受到注意。社會底層所討論的議題大致和貧窮文化相同，但貧窮文化的爭議和社會方案的擴充有關，而社會底層卻正好相反，因為 1980 年代的政治氣候已改變了。Auletta 承認有關社會底層的最重要問題並未達到共識，包括定義、組成、所佔比率與解釋等。他所界定的社會底層由收入與行為所組成，但他大部份討論後者的問題，因為後者正對美國社會威脅著。所以，他認為社會底層是一群感到被社會排斥的人，他們也是拒絕接受一般人價值的人。他們不僅是窮人，他們的工作意願薄弱，更重要地，他們的行為似乎是偏離常軌。

然而，社會底層何以會存在呢？右派的社會福利學者提倡福利依賴理論(welfare dependency thesis)來解釋這一 1980 年代出現的社會現象。他們認為由於政府社會安全津貼過度慷慨的結果造成窮人的價值觀念缺陷。福利依賴學者的倡議者之一 Gilder (1982)認為，福利國家(the welfare state)是所有社會病(social ill)的來源，因為福利損害工作與家庭，因此使窮人永遠貧窮，而福利的理念也摧毀窮人的命運。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Gilder (1982)認為取消失業、單親家庭及其他類似的津貼，允許市場自由運作，強迫依賴福利者找工作以支持家庭及其子女的生活。在此情況下，工作倫理、家庭責任以及其他美德將增強，使貧窮消失。

自從美國政府實施大社會(great society)的福利計畫後，聯邦政府的福利方

案花費漸漸增加，受補助的人數也節節上升，因此受福利支持的人不僅在經濟蕭條時增加，更令人驚訝的是在經濟繁榮時，貧窮人口也增加，這顯然和福利的政策相反。因此，Murray(1984)認為，並非這些反功能的價值觀念造成社會底層的存在，而是窮人福利依賴的邏輯戰略形成社會底層。他們較看重福利津貼而不重視工作，特別是年輕人及單親家庭更是如此。所以，他認為社會福利政策使窮人本身所受到的傷害最大，因為福利政策提供許多阻礙家庭生活的誘因。幾乎任何人都同意家庭的瓦解與貧窮關係密切，因此他主張剷除所有的聯邦福利以及對勞動力人口的收入支持等，如醫療補助(medicaid)、食物券(food stamps)等 (murray 1984, pp. 238-239)。其結果將使貧窮減低，增加向上流動，同時對窮人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另一位學者 Mead (1989)認為社會底層的存在和工作價值感薄弱有關，由於社會底層者認為工作是他們喜歡去做的事而不是他們必須去做，工作是一種鼓舞而不是職責。因此，他認為解決社會底層的方法不是剷除社會安全津貼，而是以工作為條件的報酬方式來達到目的。我們必須使有能力的受助者工作方能改善他們自己本身的生活困境，這種強制工作的方法並非政府強迫所致，而是政府承認有責任和義務去幫助弱勢的公民。

早在 1970 年代，李長貴(1970)曾分析臺灣貧困者的態度。他將貧窮文化分為窮人的補助、自我、人際、工作、文化和將來觀念。他的研究顯示窮人年紀愈大，愈

感受到親人朋友的歧視；更重要地，窮人年齡的高低也能影響利用就業訓練來消滅貧窮的看法。他的研究也證實已婚及鰥寡者較容易感受到他人的歧視，認為一般社會大眾不願意和貧民來往，亦承認本身有濃厚的命運因素。最後，他認為窮人教育程度愈高，愈相信努力工作能改善生活，脫離貧窮。此外，窮人教育程度愈高，深信貧窮命運循環的信念也愈低。反之，他的研究也發現教育程度愈低，愈感覺到他人不願和其往來。

另有學者（廖榮利 1975, 1977）發現，我國窮人的行為特質尚不如西方國家嚴重，但也有幾項特徵值得探討。第一、窮人大多數認為自己是有用的人，同時信任別人；然而，窮人與社會團體疏離、生活在沉悶的氣氛中。第二、窮人大多感到有職責去教養子女，同時全力以赴，但由於在能力不足與環境的雙重壓力下，因此，在窮人中依然存在著許多不良的管教態度與方式。第三、窮人自尊心較低落，但還沒有代代相傳的現象。第四、窮人大部份具有奮發向上的精神，感到自己和子女前途尚稱光明，只是對快樂和幸福奢望不太多。第五、半數以上的窮人認為他們不屬於這個時代。此外，鄭為元(1977)及廖榮利與鄭為元(1982)的研究發現，低階級出身的窮人，受次文化的影響亦深。可是，窮人仍然重視兒女教養，因此，窮人的價值與態度不會經由家庭社會化而代代相傳。據此推之，窮人態度的養成實受外在環境的影響，而非受家庭教養的影響。因此，他們認為我們的社會尚未形成

嚴重的貧窮文化。

## 二、結構因素論

以上兩種對貧窮現象的解釋著重在個人層面的探討，這種看法在 1970 年代初期並無法完整的解釋當時美國的貧窮問題。很顯然地，個人致貧因素論忽略了社會結構因素對貧窮的影響。因此，在 1970 年之後，個人致貧因素論就遭到嚴重的質疑與挑戰，於是有結構學派的看法出現。這一派的學者主要是針對人力資本理論或貧窮文化論無法改善或解決貧窮的問題而提出新的主張。

針對人力資本理論或貧窮文化論這兩派的缺點，結構學派認為貧窮除窮人本身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社會環境的結構會影響貧窮的產生。窮人之所以存在，社會結構很顯然地居於主導的外在因素地位。由於社會結構並非個人能力所能改良的，因此，他們認為貧窮本身並不是罪惡，反而是社會結構才是造成貧窮的重要因素。

其實，就這一派的看法而言，貧窮問題的產生和個人與家庭所賴以維生的週遭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亦即貧窮不只是個人或家庭的問題，亦是社會結構變動下的產物，只是貧窮的形式或許沒有改變，但其所隱含的內容或結構，卻已經產生了變化。例如，窮人家庭成員就業結構的變化、窮人家庭結構的改變和貧窮的趨勢有很大的關聯。主張貧窮社會結構論的學者認為，貧窮雖有其特別的行為模式，然而，這種模式的產生，主要係在社會環境的限制下，所發生的無可奈何的結果。易言之，貧窮的發生實因個人受到環境的限制而無

法改善他們生活的困境所造成。因此，在這種社會結構下，窮人沒有辦法實現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社會價值。然而，由於社會環境為一外在因素(Durkheim 1895)，任何人沒有能力去控制社會環境，因而脫離貧窮困境的機會就微乎其微。所以，他們認為要消弭貧窮問題，唯有改變社會結構才有效。在這裡，我們將從勞力結構、家庭結構與貧窮女性化加以討論。

### (一)勞力結構

結構學派自從 Gordon (1971, 1972)與 Piore (1971)以雙元勞力結構市場來解釋就業結構的體系時，就受到廣泛的注意，引起學者強調結構因素探討的重要性。他們將勞力市場分為初級和次級勞力市場(primary and secondary labor market)(Gordon 1971, 1972; Piore 1971)。初級勞力市場的工作具有職業穩定、升遷系統較有體制、報酬較高以及較好的工作環境等特徵；次級勞力市場上的工作則正好相反，個人升遷機會少、報酬低、工作環境差與職業不穩定是其特點。因此，初級勞力市場屬於私人經濟的核心部門，次級勞力市場則存在於邊陲部門。

Gordon (1972)強調，初級勞力市場和次級勞力市場之間的流動非常少。所以，當一個人由次級勞力市場開始其工作生涯時，則其進入初級勞力市場的機會幾乎等於零，形成終其一生只能在次級勞力市場討生活的境遇。由於次級勞力市場的報酬是由勞動力所決定，所以其報酬往往是以工時或接件來計算其收入。因此，個人的



貧窮不是因為這些人沒有工作或不參與經濟活動，而是他們所參與的經濟結構決定其命運。

Beeghley (1988)的研究發現，有失業經驗家庭的平均收入中位數比沒有失業經驗的家庭少 30%。因此，有失業經驗或工作報酬收入較低者特別容易陷入貧窮的困境。此外，有 14%年滿十五歲以上的窮人每年工作五十到五十二週之間。對於這些工作貧窮者而言，工作報酬太低而非缺乏工作動機是致貧主要因素，因為有些人是因只做兼差的工作。許多人因受工作不穩定、低工資以及失業其間的長短而致貧。因此，一個人努力工作，並不能保證獲得高的報酬。

Wilson (1987)認為美國都市裡的中下階層由於製造業外移使得他們的就業機會減少；而服務業的興起，正好導致勞力市場工資的兩極化。雖然，服務業提供部份下層階級的就業機會；但製造業大量外移卻造成多數黑人喪失工作的機會(Kasarda 1985)。因此，都市中的社會底層不僅受到製造業外移導致就業機會減少；然而，相對而言，服務業並未提供相對的就業機會，反而加速工資報酬的不平等，形成貧窮集中的現象。因此，他認為都市中的黑人因缺乏教育與工作經驗，使得他們無法找到工作，造成黑人家庭貧窮的現象。

Wilson 在「當工作消失」一書中(1996)發現，當一家公司將其營運從美國存在已久的社區轉到國外時，人們會失去工作；商店失去顧客。這個淒慘的過程在過去十餘年不斷地發生。這就是所謂的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系統而又全面地將工廠等生產基本層面的投資撤銷（劉鶴群、房智慧譯 2005，368-369）。這個去工業化的現象，使開發國家的企業大量往國外移動，尋求商機，但卻使得工業化國家的就業機會大量減少，形成失業的風潮，這在美國最為明顯。目前的臺灣社會也有類似工業化國家的例證。

## (二)家庭結構

在有關貧窮的研究裡，家庭結構是有力的解釋因素之一。一般認為家庭破裂是使個人及家庭落入貧窮困境的主要因素。因此，在 1970 年代，「貧窮女性化」就成為這一關係的重要特徵(Pearce 1978)，這表示女性單親比男性單親家庭更易落入貧窮的困境。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儘管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但婦女所從事的工作大多是報酬最低的工作（引自 Jennings 1994, p.99）。因此，女性貧窮與其可從事的工作有關。

大致來說，單親家庭貧窮的機率約比一般家庭高三到四倍，故單親家庭有較高的貧窮風險(Millar 1989)。Smeedings et al. (1988)發現半數以上澳洲和美國的單親家庭陷入貧窮的困境，而在英國、加拿大和西德亦有 40%，但在雙親家庭中卻是貧窮的風險較低(Millar 1989, p.157-158)。McLanahan 和 Booth (1989)的研究認為，在美國單親母親家庭的貧窮率比其他家庭高的基本原因是婚姻解組所造成，所以經濟不安全顯然是單親母親所面對的一大問題，因為她們為了養育子女，承擔小孩的

費用，然而，由於缺乏工作經驗，勞力市場的性別歧視以及照顧小孩等因素，使得她們的賺錢能力亦受到極大的限制。一般而言，婦女每小時平均收入約為男性的60%左右，雖然有75%的單親母親接受社會福利的救助，但仍有40%有資格受助者未得到社會福利幫助。然而，縱使得到幫助，這些人的生活情況仍然非常的貧困(Garfinkel and McLanahan 1988)。

其次，一個家庭的依賴人口愈多，其他成員的負擔愈重，而共享資源的人相對增加。因此，整個家庭的負擔就會更加沉重。在此情況下，整個家庭的資源分配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若整個家庭生產資源較少，但依賴人口很多，那麼，就有可能發生貧窮問題。依據 Felty (1991)的研究發現，貧窮率隨著黑人人口的增加和幼年依賴比的升高而增加。依賴人口增加形成家庭的貧窮地位，而這一結果也因家庭結構和種族而增強。單親母親賺錢較少，無法支持家庭生計，形成這些家庭長期依賴社會福利，進而增加這些家庭的貧窮地位。另外，女性大部份在服務部門就業，她們的工資比男性少。這種狀況亦形成她們雖有專職的工作，但收入卻仍然無法超越貧窮線的問題。所以，集中於服務業的工作、收入無法提高就是女性戶長家庭貧窮的主要根源。

在臺灣方面，根據徐良熙與林忠正(1984)的研究，台灣單親所得是所有家庭的78.8%，是比一般家庭窮，但沒有美國那麼窮。原因可能因為台灣貧窮線原本就低，以及台灣子女要孝順父母，成年子女

與單親父母同住的關係，加上單親父母宿命之人生哲學、內外兼具、只求自力更生(Shu 1989)。林萬億與秦文力(1992)的研究發現，臺北市單親家庭的收入集中在一萬五千元到五萬元之中佔三分之二，一萬五千元以上及五萬元以上者各佔17.9%與15%；若就男、女性單親家庭的收入來看，女性單親家長所得低於三萬元以下者佔70.7%，其中更有22.4%的女性單親家長所得低於一萬五千元；相反地，男性單親家長所得在三萬元以下者佔31.7%，界於三萬到五萬元者佔46%。就此一結果來說，女性單親比男性單親所得低，由此更突顯出女性單親家庭經濟的困境。因此，無庸置疑地單親家庭所得偏低是一不爭的事實。

### (三)貧窮女性化

一般而言，所謂的貧窮女性化大都指婦女的貧窮率高於男性的現象(Pearce 1978)。由於人口變遷以及婚姻破裂使得女性在貧窮人口中的比率有增無減，雖然，由於服務業的增加，使得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持續增加。雖然，從本世紀以來，婦女的勞動率增加不少，同時也大力提倡同工同酬的理念，但是婦女的收入卻遠低於男性，這一趨勢在近數十年來亦沒有太大變動(Lewis and Piachaud 1992)。形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二：第一，在勞力市場上，婦女的工作集中在少數的職業，這些職業包含秘書、文書助理等，有時被稱為婦女的工 作(women's work) (Alcock 1993, p.127)。此外，這些職業的地位低，報酬也不高，升遷的機會也不多。基本上，婦女

所從事的職業與男性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若依雙元勞力市場理論來看，婦女在勞力市場上的地位大多屬於次級勞力市場。所以，在勞力市場上，婦女比男性經歷較不安全、工作條件較差、地位較低及報酬較差的工作環境。第二，由於婦女扮演母親與工作者雙重角色，因此婦女大多從事兼職的工作。最近的研究顯示，1990年時，英國婦女平均時薪約為男性收入的77% (Lonsdale 1992)。所以，婦女在勞動市場上居於較劣勢的就業地位，這也是造成婦女較易落入貧窮困境的主要原因。

Beeghley (1988)認為大部份的女人在經濟上及其他方面都依賴男人，已婚的女人有半數未就業；然而，就業已婚的女性，其收入也比丈夫少。因此，離婚後，許多婦女及其子女就落入貧窮的困境。最近的研究也發現，有工作的女性戶長無論在城市或鄉村都較易落入貧窮的困境(Lichter, Johnston, and McLaughlin 1994)。工作顯然無法保證家庭的經濟安全以及降低對政府的依賴。

Gordon (1972)認為，由於受到性別歧視的影響，使得美國婦女大多在次級勞力市場中討生活。由於初級勞力市場和次級勞力市場之間的流動非常少，因此，當一個人進入次級勞力市場工作時，他就幾乎沒有機會進入初級勞力市場，終其一生只能在次級勞力市場中討生活。由於次級勞力市場的報酬是由勞動力所決定，所以其報酬往往是以工時或接件來計算。因此，

貧窮不是因為這些人沒有工作或不參與經濟活動，而是他們所參與的經濟結構決定其命運。

## 參、結論

本文試圖從理論的觀點，探討貧窮與工作的關係。我們從個人因素與結構因素的觀點，討論貧窮與工作的議題。我們認為，處在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在臺灣走上去工業化的路上之時，由於工廠關廠及外移中國或其他國家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不景氣，物價走高，企業裁員，更使得失業的情景雪上加霜，失業人數愈來愈多，而失業率也屢創新高。雖然政府極力鼓吹企業回臺投資，政府也很想創造就業機會，然因經濟前景不佳，創造就業的機會畢竟有限。然而，這種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問題，已是社會問題的重要一環，這已不是個人可以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個人雖有工作的意願，但因去工業化的現象，使得工作機會大量流失，縱使個人有工作意願，但也沒有工作機會。這對窮人而言，更是令人擔憂，因為處在經濟前景不佳的時刻，弱勢的窮人面對工作日漸減少的情景，縱使有心去工作，但工作的機會卻愈來愈少，受害尤烈，這或許是目前更應該重視的議題。

(本文作者張清富現為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 📖 參考文獻

- 王順民(1996),「貧窮的歷史性解構:以英、美兩國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8:78-113。
- 王維林(1962),臺北市貧民區之調查與分析。臺北市:中興大學社會學。
- 丘延亮譯(Oscar Lewis 著),2004,貧窮文化。台北:巨流。
- 李長貴(1970),貧民的貧窮觀念之分析。臺中:東海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印行。
- 林萬億、秦文力(1992),臺北市單親家庭問題及其因應策略之研究。臺北市政府研考會委託研究報告。
- 徐良熙、林忠正(1984),「家庭結構與社會變遷—中美單親家庭之比較」中國社會學刊 8:1-22。
- 梁其姿(1993),「『貧窮』與『窮人』觀念在中國俗世社會中的歷史演變」,見黃應貴主編,人觀、意義與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張清富(1992),「臺灣貧窮的結構因素」,法商學報,27:171-191。
- 張清富(1995),「臺灣貧窮的決定因素:個體論抑或結構論?」,頁129-149,見林松齡、王振寰主編,臺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臺中市: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 張清富(1996),臺灣省工作貧窮的研究。台北:時英。
- 陳淑英(1983),「突破貧窮的惡性循環:致貧因素之因徑分析」,社區發展,24:63-70。
- 溫秋蘭(1993),家戶相對貧窮與人口結構。嘉義: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湯新楣譯(John Kenneth Galbraith 著),1970,富裕社會。香港:今日世界。
- 廖偉君(1992),有工作的貧窮雙親家庭之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廖榮利(1975),「貧民和專業人員對貧窮和服務貧民的看法」,臺大社會學刊,11:94-116。
- 廖榮利(1977),「貧窮文化和貧窮問題」,仙人掌,7:159-176。
- 廖榮利、鄭為元(1982),臺灣的貧民—社會學與社會工作面的探討。臺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 鄭為元(1977),「臺灣社會工作者之社會背景與其對貧民的態度」,思與言,15:51-65。
- 劉鶴群、房智慧譯(Richard T. Schaefer 著),(2005),社會學。台北:巨流。
- 鍾喬(1992),城市邊緣。台北市:張老師出版社。
- Alcock, Pete. 1993. *Understanding Poverty*.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 Auletta, K. 1982. *The Under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ecker, Gary. *Human Capital*.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eghly, Leonard. 1988.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7:201-222.

- Blau, Peter. and Otis D.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 Devine, Joel, and James D. Wright. 1993. *The Greatest of Evils: Urban Poverty and the American Underclas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Durkheim, Emile 1895 [1982].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 Ehrenreich, Barbara. 2005. "Nickel and Dimed," Pp.393-406 in *Down to Earth Sociology*, edited by James M. Henslin. New York: Free Press.
- Felty, K. M. 1991. "Female-headed Family poverty: Tes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n Ecological Focus." *Sociological Focus* 24:329-341.
- Gans, Herbert J. 2005. "The Use of Poverty: The Poor Pay All," pp. 358-364 in *Down to Earth Sociology*, edited by James M. Henslin. New York: Free Press.
- Garfinkel, I. and S. S. McLanahan. 198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Nature, Causes and a Partial Cure." Pp. 27-52 in Donald Tomaskovic-Devey ed.,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Gilder, G. 1981.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rdon, David. 1971. *Poverty in Political Economy: An Urban Perspective*.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 Gordon, David. 1972.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Lexington, MA.: Heath and Company.
- Harrington, M. 1962. *The Other American--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acmillan.
- Jennings, James. 1994.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Poverty in Urban America*. Westport, CN.: Praeger.
- Kasarda, John D. 1985. "Urban Change and Minority Opportunities." Pp. 33-37 in *The New Urban Poverty*, edited by Paul E. Peters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 Kerbo, Harold R. 1991.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Class Conflict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Lewis, J. and D. Piachaud. 1992. "Women and Pover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C. Glendinning and J. Millar eds., *Women and Poverty in Britain: the 1990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Lewis, Oscar.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Lewis, Oscar. 1961. *The Children of Sanchez*. New York: Random House.

- Lichter, Daniel T., Gail M. Johnston and Diane K. McLaughlin. 1994. "Changing Linkages Between Work and Poverty in Rural America." *Rural Sociology* 59:395-415.
- Liebow, Elliot. 2003. *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 Lonsdale, S. 1992. "Patterns of Paid Work." In C. Glendinning and J. Millar eds., *Women and Poverty in Britain: the 1990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MacNicol, J. 1987. "In Pursuit of the Underclas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293-318.
- McLanahan, Sara S. and Karen Booth. 1989. "Mother-only Families: Problems, Prospects,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1: 557-580.
- Mead, Lawrence. 1989. "The Logic of Workfare: The Underclass and Work Policy."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1: 156-169.
- Millar, Jane. 1989. *Poverty and the Lone-parent Family: The Challenge to Social Policy*. Aldershot, England: Avebury.
- Murray, Charles. 1984.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 Patterson, J. 1981. *American's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arce, Diana M. 197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 Women, Work, and Welfare." *Urban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 11:28-36.
- Piore, M. 1971. "The Dual Labor Market: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Pp. 127-148 in *Problems in Political Economy: An Urban Perspective*, edited by David M. Gordon.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 Schiller, Barry R. 1976. *The Economics of Poverty and Discrimin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chwartz-Nobel, Loretta. 2003. *Growing Up Empty: How Federal Policies are Striving America's Children*. New York: Perennial.
- Shu, R. L. (徐良熙) 1989. "A Model to Analyze Single Parent Familie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102-153.
- Smeeding, Timothy m., B. Torrey and M. Rein. 1988.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Young and the Old in Eight Countries." in J. Palmer, T. Smeeding and B. Torrey(eds.) , *The Vulnerable: America's Children and Elderly in an Industrial World*. Washington, DC.: The Urban Institute Press.
- Thurow, Lester C. 1971. "Poverty and Human Capital." Pp. 85-90 in *Problems in Political*

- Economy: An Urban Perspective*, edited by David M. Gordon.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 Townsend, Peter. 1993. *Th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Weber, Max. 1958 [1904].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Social polic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96. *When Work Disappears: The World of New Urban Poo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Woods, Danile W. and John B. Williamson. 1988. *Think about Poverty in the U. S.*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